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論

第 五 分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三編 社会主义

一 歷 史

我們在“引論”里^①已經看到十八世紀的准备了革命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它作为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們要求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会，要求無情地毀滅一切与永恆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們同样也已經看到，这个永恆的理性，实际上只不过是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这种中等市民，在那时正發展成为近代的資產者。可是，当法國革命实现了这个理性的社会与理性的國家时，就看到，不論这个新的制度較之旧制度是如何合理，可是决不是絕對理性的。理性的王國遭受了完全的破產。盧騷的社会公約，在恐怖时代^②獲得了自己的实现；對於自己政治能力已失去信心的資產階級，为着从恐怖中挽救自己起見，起初求助於賄賂执政府^③，后来則託庇於拿破崙的專制政治，早先允諾的永久和平变成了無窮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制度，也沒有較好的命运。富有与貧窮間的对立，非但沒有在普遍幸福之中獲得解决，而且反而因为那种溝通对立的行会的和其他的特权的廢除，以

① 参看“哲学”第一章。（恩格斯註）

② 在1793—1794年以雅各宾派（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劳动貧民的代表）为首的法國革命政府採取恐怖統治來作为对反革命進行斗争的手段。——譯者註

③ 执政府是1794年法國資產階級在推翻雅各宾派專政后所建立的政府。执政府从1795年起繼續存在到1799年，以后被拿破崙第一推翻。拿破崙开始称为統領，后来便称皇帝，他指揮法國進行許多侵略的战争。——譯者註

及那种稍微緩和貧富對立的宗教慈善設施的廢止，而更加尖銳化起來。[現在在事實上所實現了的脫離封建桎梏的“財產自由”，對於小資產者和農民，不過是把他們被大資本、大地產的強烈競爭所壓碎的小財產出賣給這些大財主的自由罷了。這樣，“財產自由”對於小資產者和農民變成了脫離財產的自由。]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工業的迅速發展，使得勞動羣眾的貧窮與困苦成為社會生存的必要條件。[現金交易，像卡萊爾(Carlyle)^①所說的，日益成為這一社會的唯一的聯繫因素。]犯罪的數目一年一年地增加。如果以前的白晝橫行的封建的罪行——這些就是到現在也沒有消滅——如今變成了次要的話，那麼，以前只在暗下偷着做的資產階級的罪惡，現在卻放肆進行了。商業日益變成為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實現於競爭所產生的詭計與嫉視之中。賄賂代暴力的壓迫而興，金錢代替了大刀成為社會權力的主要槓桿。“初夜權”從封建主轉移於資產者、工廠主。賣淫增加到空前的程度，甚至婚姻本身，依然和以前一樣，是法律所承認的賣淫形式和賣淫的官式的掩蓋，而且此外還有多得很的通姦事件來作補充。總而言之，“理性勝利”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現出是對於啓蒙學者所作的美好約言的殘酷的諷刺，它引起了人們深深的失望，所缺少的，只是陳述這種失望情形的人罷了，而這種人，在新世紀來到時，也就出現了。在1802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翰集”；在1808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雖然他的理論的基礎早在1799年時就已經奠定了；在1800年1月1日，歐文接受了新拉納克廠的管理。

可是，在這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大工業在英國剛剛興起，在法國還不知道。可是只有大工業，它一方面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

^① 卡萊爾是英國封建社會主義的代表之一（見“共產黨宣言”）。——譯者註

中的革命[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廢除]成為迫切的需要的衝突——這不僅是大工業所形成的諸階級之間的衝突，而且是它所創造的生產力和交換方式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也只有這種大工業才在生產力的偉大發展中提供解決它自己所造成的衝突的手段。所以，如果在十九世紀之初，從新的社會體制中產生出來的衝突，還正在開始發生，那麼，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在這時期，自然是更少發展了。雖然巴黎的沒有財產的羣眾，在恐怖時期，短時的獲得了統治權，[並且這麼一來，便能夠在反對資產階級本身中，領導資產階級革命趨於勝利；]那麼，他們只是以此証明了，在那時的條件下，這些羣眾的[持久]統治是完全不可能的。無產階級還剛剛從一般沒有財產的羣眾中分離出來成為新的階級的萌芽，它還完全不能作獨立的政治行動，它表現出只是一種受苦的被壓迫的等級，由於它無力幫助自己，所以對於它的幫助只能來自外面——來自上面。

這種歷史的情況決定了社會主義的創始者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適應着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成熟的狀況、不成熟的階級關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既然還在不發展的經濟關係中隱藏着，所以不得不從頭腦中發明出來，創造出來。社會制度表現出來的只是種種的缺點，消除這些缺點乃是思維着的理性的任務。需要的是，發明一種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的體系，並且通過宣傳，在可能的時候，更用示范的試驗的例子，從外面把它強加到現存的社會中去。這些新的社會體系，預先就被判定不得不陷於空想，它們愈是用心去詳盡細致地規定，則它們愈是不得不墮於純粹的幻想。

指出這一點後，我們就將一分鐘也不再停留在問題的這一方面，因為這在現在完全是屬於過去的事了。讓文學上的雜貨店主如杜林先生之流去自滿自足地挑剔這些現在看來似乎是可笑的幻

想，而讓他們以自己的思想方法比較這種“狂亂”來得清醒而去自豪吧！遠使我們更加欣喜的，是在每一步上冲破幻想的外殼而暴露出來的那些天才思想的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盲目的庸人却看不到這些。

[聖西門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大革命開始時，他還不滿三十歲。這次革命，是第三等級即民族中從事生產和貿易的大多數人對於以前享有特權的遊惰等級（貴族和僧侶）的勝利；但是，很快地暴露了第三等級的勝利只是這個等級中一小部分人的勝利；這個勝利使第三等級中享有社會特權的階層——富有的資產階級——夺取了政權。而且這個資產階級，早在革命過程中，就已迅速地發展起來。一方面由於他們對當時被沒收和以後被拍賣的貴族和教會的地產，實行了投機；他方面由於他們供應軍用品而詐欺了民族。正是這些投機者的統治，在執政政府時代使得法國和革命瀕於破產的邊緣，並使拿破崙得以借口來舉行他的國家政變。因此在聖西門頭腦中，第三等級和特權等級之間的对立就採取了“勞動者”和“遊惰者”之間的对立的形式。所謂“遊惰者”不僅指舊時特權等級的人們而言，舉凡不參加生產和貿易而依靠租息收入為生的人都包括在內。所謂“勞動者”不僅指僱傭工人而言，而且廠主、商人、銀行家也算在內。“遊惰者”失去了精神領導和政治統治的能力——這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已被革命所最後証明了。可是按照聖西門的意見，恐怖時代的經驗，証明了無產羣眾也沒有這種能力。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誰應該領導和統治呢？據聖西門的意見，應當是科學與產業，它們被新的宗教聯系結合起來，這種宗教聯系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級森嚴的“新基督教”，其使命為恢復那種從“宗教改革”時代以來被破壞了的宗教觀念的統一。可是科學，這就是科學家，而產業則首先是積極的資產者、廠主、商人、銀

行家。固然，这些資產者据他說应当成为某种社会官吏、全社会所信託的人，但是對於工人，他們还保持發号施令的和經濟上握有特权的地位。至於銀行家，正是他們負有使命，通过調剂信用來調剂整个社会的生產。这样的見解是完全適應於那一时代的，那时，在法國，大工業以及随之而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剛剛处在產生的过程中。但聖西門所特別着重的乃是这点：他無論何時何處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貧窮的階級”（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

在聖西門的“日內瓦書翰集”中，已經提出这样的原則：“一切人都应当劳动”。在同一著作中，他也已經指出，法國的恐怖統治是無產羣眾的統治。他告訴他們道：“看呵，當你們的同志統治着法國的時候，法國發生什么事情，他們造成了飢餓！”可是，理解到法國革命[不僅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而且]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的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 1802 年可說是高度天才的發現。在 1816 年，聖西門宣佈，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預言政治將要被經濟所完全併吞。如果在這兒，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種見解還只表現於萌芽形式中的話，那麼，對人的政治管理，應當變為對物的管理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這種思想，就是說，“廢除國家”這種思想（這點，最近是甚囂塵上的），在這兒已經完全明白地說出來了。同樣地比較其同時代的人為優越的是：在 1814 年緊接着聯軍攻入巴黎之後，並在 1815 年百日戰爭^①時，聖西門聲稱法國和英國的同盟以及此兩國和德國的同盟，

① 拿破崙第一的侵略戰爭，結果使拿破崙失敗。差不多一切歐洲國家，以英國和俄國為首，組成一個聯盟來反對法國。1814 年，巴黎被聯軍所佔，拿破崙不得不退位，1815 年，拿破崙重新企圖恢復自己的政權並與聯軍進行了新的戰爭（百日戰爭），但又在滑鐵盧被戰敗，被聯軍所執，流放於聖赫倫島，而死於島上。——譯者註

是歐洲和平發展和繁榮的唯一保證。無論如何，在1815年向法國人宣傳同滑鐵盧的戰勝者建立同盟，比較向德意志教授們宣佈閒話上的戰爭是需要更多的勇氣的^①。

如果從聖西門那里，我們看到的是天才的眼光遠大，因之，在他的觀點中包含着後來的社會主義者們的差不多一切的、並非嚴格是經濟的那些思想的萌芽的話，那么在傅立葉那里，我們看到對於現存社會制度的批判，在這種批判中，純粹的法國的機智和其分析的極大的深刻性相結合。傅立葉抓住了革命前資產階級的狂熱的預言家以及革命後它所收買的頌揚者的話。他無情地暴露了資產階級世界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全部貧困；拿這種貧困來和[以前]啓蒙學者的輝煌的約言相比較，啓蒙學者曾經允諾建立只為理性所統治的社會和給予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拿這種貧困來和啓蒙學者所說人類有進達無限美滿境地的能力相比較。傅立葉揭破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美詞句的空虛，指出與他們的好聽詞句相適應的現實是如何可憐，他辛辣地嘲罵這種空洞詞句的完全破產。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而且因其樂天的性格，他還是一個諷刺家，甚至是自古以來最大的諷刺家之一。他用巧妙的同時令人發噤的詞句，描寫了革命低落時代當時法國全部商業活動中盛極一時的投機騙術和小商販習氣。更加巧妙的是他對於資產階級社會中兩性關係和婦女社會地位的批判。在每一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這一思想第一個是屬於他的。但傅立葉的偉大最顯著地表現在他的社會歷史觀上面。他把社會歷史全部已往的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野蠻、宗法和文明——後者在他那里是和現在所謂市民社會^②相吻合的，[也就是說和從十六世紀以來發展着的社會秩序相吻合的；]他指明“文明階段怎樣使

^① 這句話恩格斯似乎是暗指杜林與柏林大學教授們的爭執。——俄文版編者註

得野蛮階段的每一个以簡單形式來实行的罪惡，採取了复雜的曖昧的兩面的虛偽的生存形式”。他指出：文明是运行於不能克服的經常复生的矛盾的“罪惡的循环”中，文明所达到的結果永远是和它原來所誠意期望或假意期望的相反的；例如，在“文明階段，貧困就是由富裕本身所產生的”。我們可以看見，傅立叶是与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同样巧妙地掌握着辯証法的，同那說人有進达美滿境地的無限能力这种空話相反，他同样辯証地断言，每个歷史时代，各有其上升綫和下降綫，並且在整个人类的未來上面，他更進一步發揮了这个观点；像康德在自然科学中得出了地球的未來的滅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其歷史觀中包含了人类未來的滅亡的思想。

正当革命的風暴橫掃法國大地的時候，在英國也經過一次較不喧囂的然而一樣巨大的變革。蒸汽和新的機器生產，把手工工場轉變為現代的大工業，並因此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手工工場時候的爬行似的發展進程，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疾風驟雨的時期。社會愈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在他們之間，代替舊時的穩定的中間階層而出現的，是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不穩定的羣眾，他們過着非常動盪的生活，並成為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在當時還只處在向上發展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正規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可是這種生產方式在那時已經足以產生出驚人的社會的痛苦了；在大城市的最惡劣的陋巷里，麇聚了無家可歸的人民大眾；一切舊時遺傳下來的聯系、宗法的結構、家庭都被破壞了；勞動時間可怕地延長了，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勞動人民，突然地被投入

② 在恩格斯曾為之作序的英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這地方寫成“現在所謂市民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俄文版編者註

于完全新的条件之中，〔从鄉村轉到城市，从農業轉到工業，从穩定的生活条件轉到每日变化的不可靠的生活条件，〕他們中間大批地墮落了。这时候一个二十九歲的厂主作为一个改革家而出現了，这人具有孩子似的純潔的天真爛漫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欧文領悟了十八世紀啓蒙学者——唯物主义者的学說，即人的性質，一方面是天然机体的產物，另一方面是人的一生的特别是他的發展时期的周圍环境的產物。大多数与欧文同一社会地位的人們，在產業革命中只看到混沌和紛乱，便于他們渾水摸魚，迅速發財。而欧文則在產業革命中看到实行他的心爱的理想以便在混乱中樹立秩序的良好时机。在曼徹斯特，他当时是一个五百工人的工厂的領導者，他企圖实行这个理想而且得到了成效。从1800年至1829年，他在苏格蘭的新拉納克管理了一个大紗厂；并且以企業股东的資格按同样的精神办事，这一次他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獲得更大的成功，使他的名字很快地就傳遍了欧洲。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二千五百人，原先其中包括極其复雜、而且大部分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地方变成十分模範的新村，其中沒有酗酒、警察、刑事法庭、審判、貧困救济和慈善事業的需要。他之能够达到这点，唯一的只是因为他把人們放在更適合于人的品格的条件之下，特别是关心于逐漸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良好教育。在新拉納克，第一次創造了幼兒園，这是欧文所想出來的。幼兒園接受兩歲以上的兒童，他們在幼兒園中，这样快乐地过着生活，使得他們的父母簡直难于領他們回去。正当他的競爭者强迫工人每天劳动十三小时至十四小时的时候，在新拉納克劳动時間却不超过十小时半。当棉紡業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时，工人还繼續支領全部工資。可是不管所有这些，企業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一直到結束为止，它使股东們獲得了优

厚的收入。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使欧文滿意。他給他的工人所創造的生存条件，在他眼中看来，还远不是合於人的品格的。他說道：“这些人是我的奴隸”。他給新拉納克工人的比較良好的条件，远不足以使他們的性格和聰明正确地全面地發展起來，更說不上自由發展他們的能力了。“可是这二千五百人中劳动的一部分人替社会所生產的真实財富，在差不多半世紀以前需要六十万人口中劳动的那部分人^①來生產。我自問：这二千五百人所消費的物品量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消費的物品量之間的差数，究竟放到哪里去了呢？”答复是明白的。这个差数，除了支付工厂的所有者按其在全業所投資本的百分之五的年利以外，还付給他們以三十万金鎊（六十万馬克）的利潤。新拉納克已經是这样，英國一切其他工厂更加是这样了。“沒有这个机器所創造的財富的新源泉，就不可能進行推翻拿破崙的战争，並恢复貴族的社会制度的原則。这个新的力量，乃是劳动者階級所手創的。”^② 这一力量的果实，因之也应当屬於劳动者階級。新的雄偉的生產力，以前只是为着少数人發財，而羣众則反受奴役，在欧文看来，它是社会改造的基礎，並且应当作为一切人的公共財產，來僅僅为着一切人的共同幸福而工作。

在这种純粹營業的基礎上，即作为商業計算——可以这样說的話——的結果，產生了欧文的共產主义。他徹底地保持了这个實踐的性質。例如，在1823年，欧文定出了消除以愛爾蘭的貧窮为目的的共產主义新村的方案，在这方案上，他附錄了必需的建設

① 这一句是根据英文本譯的，俄文本於“六十万人”下，沒有劳动部分字样。——譯者註

② [摘自“心理上和实际上的革命”，这是欧文寄給“欧洲紅色共和党人，共產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和1848年法國臨時政府的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同样地也寄給了“女皇維多利亞及其負責的顧問們”。]（恩格斯註）

資本、常年費用和大約收入的詳細計算。在欧文關於未來社會的最後計劃中，他規定了一切技術上的詳情細節，直至平面圖、正面圖、鳥瞰圖。所有這些，都做得是這樣的內行，使得人們如果接受了他的改革社會的方法，那麼在詳情細節上，即使從專家們的眼光看來，也是很少可以非議的。

轉變到共產主義是欧文生活上的轉折點。當他單純作為慈善家行動之時，他所獲得的僅僅是財富、讚揚、聲望和名譽。他是歐洲最有名望的人。不僅和他同一社會地位的人，就是連大臣們和皇親國戚們也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可是當他一旦提出了自己的共產主義理論，情況就立刻改變了。按照他的意見，有三大障礙：私有財產、宗教和現代的婚姻形式，堵塞社會改造的道路。當開始和這些障礙作鬥爭時，他知道，他就要被逐出上流社會，並且喪失自己的社會地位；但這些顧慮不能使欧文卻步，不能減弱他無情攻擊的力量。他所預料的事結果都發生了。他被逐出了上流社會，被輿論界所封鎖，由於在美洲遭受失敗的共產主義試驗，耗盡了他的所有財產，他貧困了，他直接求助於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間他繼續了以後三十年的活動。當時在英國發生的為着工人階級利益的所有社會運動及其一切真實成就，都是與欧文的姓名分不開的。例如在 1819 年，由於他的五年的努力，通過了第一個限制工廠中女工和童工勞動的法律。當第一次工會代表大會上全英國工會聯合成為一個大的總的職工會^①之時，他是這次代表大會的主席。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去的辦法，他一方面組織了合作社（消費的和生產的），這些合作社往後至少在實踐上證明了，

^① 1833 年 10 月，欧文在英國工會代表大會上當主席，這次大會通過了將英國工會的組織在全國範圍內聯合起來的決定。產生於 1834 年的“全國職工會大聯合”，是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英國職工聯合組織的最初嘗試。在 1834 年末，這一組織停止了自己的存在。——譯者註

沒有商人和廠主，是可以過得去的；他另一方面組織了勞動商場，在這商場中，勞動生產品的交換，用“勞動券”作媒介，其單位是小時勞動時間。這些商場是必然要陷於失敗的，但它卻完全預示了往後晚得多的蒲魯東的交換銀行^①，其不同處，在於歐文並不認為它是醫治一切社會罪惡的萬應良藥，而只是把它作為走向遠更急進的全社會改造的最初步驟之一。

這些就是權威的杜林先生從他的“終極的最後真理”的高台上以如此輕蔑的態度所睨視着的人們：這種輕蔑態度的例子，我們在“引論”中，已經說過了。在某種意義上講來，這種輕蔑態度，也有它充分的根據：在實質上講，這種蔑視，它的來源是在於對所有三個烏托邦主義者的著作真正可驚的無知。譬如關於聖西門，在杜林先生的書上，這樣說道：“他的根本思想，實質上是正確的；如果略去某些偏頗之見，那麼他即在現時也能給真實的創造以刺激。”不管杜林先生好似真的在手上拿着聖西門的某幾部著作，可是我們在他論述聖西門的整整二十七頁上，絲毫找不到聖西門的“基本思想”，好像以前我們找不到對於下列問題的回答一樣，即：揆內的經濟表“對於揆內本人究竟應有什麼意義”。歸根到底，我們不得不以下述空話為滿足，說：“想像和慈善的熱情……以及與它相適

① 蒲魯東(1809—1865年)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又是無政府主義的始祖，他認為解脫發展著的資本主義的一切痛苦的方法，不是在於向社會主義前進，不是在於無產階級的為着社會主義制度而進行的階級鬥爭，而是在於倒退到小農——獨立生產者的制度上去，這種制度，以小的私有財產為基礎，並且不要有雇傭勞動的剝削。他的交換銀行，就應當為此而工作。根據蒲魯東的方案，這一銀行，應當按照“生產者”在其生產品上所化費的勞動來實行他的生產品交換（“勞動換勞動”），並且用這方法，使他們的小生產與小私有財產能夠免除破壞、貧弱和毀滅。至於工人，那麼要把他們從資本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也同樣要依靠交換銀行，這一銀行，將把他們轉變為獨立的小生產者。——譯者註

应的幻想的極度誇張，支配着聖西門的全部思想！”从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僅僅知道那种描寫得直如小說上那样細致的、关于未來的幻想，他僅僅注意於此——当然，为着确定杜林先生較之傅立叶是無限的高超，上述这点，自然是比較研究傅立叶怎样“附帶地企圖批評现实关系”，“要重要得多”。附帶地！其实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頁都放射出諷刺与批判的光芒來揭露那种如此被人謳歌的文明的丑惡。这正好似某一个人說：杜林先生僅僅“附帶地”推崇杜林先生为古今最偉大的思想家一样。至於論述欧文的十二頁，那么在这里杜林先生所应用的絕對沒有别的資料，而只有俗物薩尔干特(W. L. Sargant, 1809—1889)所寫的可憐的傳記，这位先生，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欧文的最主要的著作，即关于婚姻及共產主义制度的著作，僅僅因为如此，杜林先生才敢断言：在欧文那里“不要打算看到坚决的共產主义”，無論如何，如果杜林先生手里拿着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書”(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那么，他在这本書里不僅可以看到最坚决的共產主义的直接陈述——主張一切人有劳动的平等义务与獲得生产品的平等权利(欧文在此总是附帶指出平等是要同年齡相適應的)，——而且还可以看到为未來共產主义公社所作的十分詳細的房屋設計，有平面圖、正面圖及鳥瞰圖。可是一个人要是像杜林先生那样，把“對於社会主义思想代表者的著作的直接研究”，限於只看題目，或最多只看其中少数著作的标题，那么，他自然只会作出如此荒謬的或者簡直是捏造的断語。欧文不但提倡了“坚决的共產主义”，而且在五年之中(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还在海姆拍夏的 Harmony Hall (和洽之家) 新村，在实际上施行了共產主义，在坚决这个意义上講來，这共產主义可說是無与倫比的了。我个人知道以前参加这个模范共產主义試驗的几个人。可是关于所有这一切，以及

一般的關於 1836—1850 年之間歐文的活動，薩爾干特絲毫也不知道，所以杜林先生的“更深奧的歷史記述”，在這個問題上，也陷於無知的黑暗之中。在論歐文時，杜林先生說他“在各方面講來，都是討厭的慈善事業的真正怪物”；可是當杜林先生向我們敘述他連題目與標題也難得能夠看過的那些書籍的內容時，那麼，我們無論如何無權說杜林先生“在各方面講來都是討厭的無知的真正怪物”，因為這種話在我們口上，就叫作“謾罵”。

我們已經看到，烏托邦主義者之所以為烏托邦主義者，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尚是如此薄弱的時代，他們不能成為別的樣子。他們不得不從他們頭腦中編造出新社會的因素來，因為這些因素，在舊社會本身中還沒有顯露到能為大家所看清的地步，他們在擬制了自己新建築計劃後之所以不得不限於向理性求助，正因為他們那時還不能求助於他們同時代的歷史。可是在他們發表言論之後，差不多經過了八十年，在舞台上出現了杜林先生，他帶著這樣的野心，要構造出新社會制度的“權威”體系，他不是從現成的歷史地發展起來的材料去把它構造出來，作為這些材料的必然的結果，而是從他權威的頭腦中、從他滿含“最後真理”的理性中，把它構造出來，這正指出到處去發覺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正是最新近的烏托邦主義者。他把偉大的烏托邦主義者，稱為“社會的鍊金術者”。就算如此吧，鍊金術在其當時也還是必需的。可是自以此來，大工業已把那些蟄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矛盾，發展成為如此強烈的對抗，使這種生產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潰，可說是可以用手去觸覺到了。只有採用新的同生產力的現在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力，才能保存和往前發展；這種對立，發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使得現存生產方式所造成的，並且由它（即生產方式。——譯者）在日益尖銳的對立中經常再生產出來的那兩個階級

之間的斗争，普遍於所有文明國度，並日益劇烈起來。所以現在已能理解到這些歷史的相互联系，理解到由於這種相互联系而成為必然的那種社會改革的條件，並且也已理解到這種改革的基本特征。如果杜林先生現在不是從現存的經濟材料去構造新的烏托邦的社會制度，而是簡單地從自己至高無上的腦袋中來把它構造出來，那麼，僅僅說他從事於“社會鍊金術”是遠遠不夠的。其實，杜林先生之所為，正好像某人在近代化學的規律被發現和確立之後，還異想天開要使舊的鍊金術復活，而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價、結晶學、光譜分析法等，唯一的目的是為了要發現……點金石。

二 理 論

唯物的歷史觀，從下述的原則出發，即：生產和生產之後的生產產品的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出現於歷史上的社會中，生產產品的分配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階級或等級的劃分，是由這個社會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生產產品來決定的。因之，一切社會變化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求之於人們的頭腦之中，也不應該求之於人們對於永恆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長的理解之中，而應該求之於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之中；這些原因，不應求之於哲學，而應求之於各該時代的經濟。對於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與不公平、和對於“理性變成了荒唐，幸福變成了痛苦”^①的日益覺醒的認識，不過是一種標誌，指示着在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之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這樣的變更，使得從舊的經濟條件產生出來的社會制度，已經不能和這些變更相適應了。這上面也指出：消滅這些已經發覺了的禍害的手段，也應當以或多或少

① 哥德“浮士德”中麥非斯多費爾的話。——俄文版編者註

的發展的形式，具備於變化了的生產關係本身之中。可是這些手段，不能從頭腦中被發明出來，而應該借頭腦之助，從當前的生產的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那麼，這樣看來，近代社會主義的情形怎樣呢？

現在，大家都承認，現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能並容的；資產階級破壞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会制度、自由競爭的王國、來往的自由、商品所有者的平權，一句話，一切資產階級的妙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和新機器把旧的手工工場變成大工業之後，在資產階級支配之下所造成的生產力，以向所未聞的速度與向所未有的規模，往前發展着。正如手工工場和在其影響之下改進了的手工業，在當時與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在其更高發展的階段上，也就不不得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局限着它的狹隘的範圍發生衝突。新的生產力，已經大大地超越了資產階級的使用生產力的方式。這種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之間的衝突，絕不是僅僅在人們頭腦中產生的衝突，——像人的原始罪惡與神的正義之間的衝突那樣，——而是存在於現實中，客觀地在我們之外存在着，甚至不依賴於創造它的那些人們的意志和行動。現代社會主義，正就是這個事實上的衝突在思想上的反映，在頭腦中的——首先是在直接吃它的苦頭的那個階級（工人階級）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這種衝突，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在資本主義生產未出現之前，即在中世紀，到處存在以生產者的生產資料的私有為基礎的小生產；在農村中佔支配地位的是自

由的或農奴的小農經營，在城市中——手工業。勞動資料——土地、農具、作坊的和手工的工具——曾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備個人應用，所以不得不是碎小的、粗陋的、狹隘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們通常是為生產者自身所有的。把這些分散的碎小的生產資料集中起來，加大起來，使之轉化為近代生產的強有力的槓桿——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代表者（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在歷史上，自十五世紀起怎樣經過生產的三個不同的階段（簡單協作、手工工場及大工業）來完成這個作用——這些，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中已經作了詳盡的敘述。像馬克思在那里所證明的一樣，資產階級如要把這些有限的生產資料轉為強大的生產力，那麼他們就不得不把它們從個人使用的生產資料，變成只有很多人共同一起才能使用的社會的生產資料。紡紗機、織布機、蒸汽錘代替了手紡車、手織機及手用錘；需要數百數千工人共同勞動的工廠，代替了小的作坊。和生產資料一樣，生產本身也從一系列的分散的行動變成一系列的社會的行動，而生產品也從個人的生產品變為社會的生產品。現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勞動的產品，這些產品在完成之前，先要按一定的順序經過他們許多人的手。沒有一個人單獨地能夠說：“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生產品。”

在以自發的〔沒有任何計劃的、逐漸產生的〕社會分工作為基本生產形式的社會內，這種分工必然地使生產品採取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換、買賣使個別的生產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樣的需要。在中世紀，情形就是如此。例如，農民把農產品賣給手工業者，而從他那里買得手工業品。在這一種個別生產者、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萌發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一生產方式，在支配於全社會中的自發的沒有計劃的分工當中，樹立了在個別工廠